

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

国立北平研究院简史

刘晓 著

國立北平研究院簡史

- 近代學術界留法群體的形成及其科學實踐
- 北平研究院的建立與機構設置
- 北平研究院的黃金時期
- 學術高地——北平研究院理化部
- 門類齊全——北平研究院生物部
- 時空記憶——北平研究院人地部
- 風格獨具——研究會與附設機構
- 北平研究院戰時遷滇及復員時期
- 北平研究院學術會議及會員制度的建立
- 從北平研究院到中國科學院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

国立北平研究院简史

刘 晓 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立北平研究院简史 / 刘晓著.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11
(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
ISBN 978-7-5046-6728-1

I. ①国… II. ①刘… III. ①科学院—科学事业史—
北京市—民国 IV. ①G3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8962 号

总 策 划 沈爱民 林初学 刘兴平 孙志禹
项 目 策 划 杨书宣 赵崇海
出 版 人 苏 青
编辑组组长 吕建华 赵 晖

责任编辑 李 红 许 慧
责任校对 孟华英
印刷监制 李春利
责任印制 张建农

出 版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发 行 科学普及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6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电话 010-62103349
传 真 010-62103166
网 址 <http://www.cspbooks.com.cn>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046-6728-1/G · 666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总 序

科技是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创新是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当今世界，科技日益深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科技创新发展水平深刻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科技著作是科研成果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形式。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历史，高水平学术论著的出版常常成为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的重要里程碑。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在他逝世前夕出版，标志着人类在宇宙认识论上的一次革命，新的科学思想得以传遍欧洲，科学革命的序幕由此拉开。1687年，牛顿的代表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问世，在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和哲学等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标志着牛顿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诞生。1789年，拉瓦锡出版了他的划时代名著《化学纲要》，为使化学确立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化学新纪元的开端。1873年，麦克斯韦出版的《论电和磁》标志着电磁场理论的创立，该理论将电学、磁学、光学统一起来，成为19世纪物理学发展的最光辉成果。

这些伟大的学术论著凝聚着科学巨匠们的伟大科学思想，标志着不同时代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展，成为支撑相应学科发展宽厚、坚实的奠基石。放眼全球，科技论著的出版数量和质量，集中体现了各国科技工作者的原始创新能力，一个国家但凡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无一例外也反映到其出版的科技论著数量、质量和影响力上。出版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著

作，成为科技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和出版工作者的不懈追求。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在组织开展学术交流、科学普及、人才举荐、决策咨询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学科智力优势和组织网络优势。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是中国特大型国有独资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科技创新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2011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联合设立“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资助全国从事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或技术开发、改造和产品研发的科技工作者出版高水平的科技学术著作，并向45岁以下青年科技工作者、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得者倾斜，重点资助科技人员出版首部学术专著。

由衷地希望，“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的实施，对更好地聚集原创科研成果，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和学科发展，促进科技工作者学术成长，繁荣科技出版，打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学术出版品牌，产生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是为序。

序

在进行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历程的研究中，一个不能回避的议题就是国家科研机构及相应制度在这一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1949年春天，中共中央刚刚迁入当时的北平就开始谋划成立国家科学院，11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整整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正式办公。这一事实往往被论者作为新政权重视科学的依据，然若不将政权更迭和意识形态转换等政治因素当作唯一的视角，而从中华文明道统传承的立场来看，中国科学院的挂牌开张，不过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科学制度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早在中国知识界展开“科玄论战”的1923年，就有人在国会提出“创设国立科学院”的议案。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相继在上海和北平成立。这两家“国字号”的科研机构几乎同时出现，主事者和重要干部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20余年共存期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虽完全一样，但两者在组织形式、战略布局、研究旨趣和历史地位等方面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后人对它们的研究和评价也大为不同。

目前，关于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而对北平研究院的调查、研究与评价——相对于它在中国科学事业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而言，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另一方面，相比于蔡元培、胡适等人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文化与学术史上均留下了巨大的足迹，北平研究院的创始人李石曾却像个被历史遗忘了的角色。个中原因，固然与这位出身晚清巨宦家庭并同北方政界知识界有密切联系的人物的个人秉性、理念、人脉、办事风格

以及躬行实践有关，根本的原因还须从制度方面去探究。

概言之，虽然都由中央政府拨款并具备“国立”这一头衔，中央研究院是全国性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北平研究院却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中央研究院的布局较为全面并具战略考量，北平研究院在组织结构上往往因人设庙；中央研究院的成员以留学英美者居多并能兼收并蓄，北平研究院的骨干几乎是清一色的留法派；1949年以后中央研究院部分人员迁台后该机构得以继续生存并发展至今，北平研究院在政权转移后就不复存在。

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机构史的研究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有意扬“中”抑“平”的倾向。若以上述因素作为理由，忽略北平研究院及其创建者们在中国科学制度化进程中的贡献就有失公允了，对此只要列举一些有趣的史实就足以说明问题。

一、无论是中央研究院还是地方研究院，都是国民党元老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政治新贵间政治交易的结果。所谓的“四老”在当年有所分工：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分别负责中央研究院、浙江研究院（未果）和北平研究院，而由吴稚晖总其成。

二、创建中央研究院的议案，首先是李石曾于1927年4月17日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来的，筹划中的研究院原本是他在中法引进法国“大学区”科研—教育体系尝试的一部分。

三、脱胎于评议会制度，中央研究院于1948年3月25日选出首批院士81人；借助于学术会议，北平研究院于同年8月21日通过90人与院士资格相当的“会员”名单。同时身兼首届“两院院士”的共有36人。

四、吴大猷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令人失望，而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在实验物理方面更为积极与活跃。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和后来的原子学研究所实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严济慈、钱三强、何泽慧、陆学善、钟盛标、郑大章等均为一时翘楚。

五、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冬，蒋介石在重庆发表题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地位与前景》的演说，主张大幅度提高对国立研究院的经费支持，以期

在 25 年内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科学领先的国家，演讲中两次将北平研究院与中央研究院并列。

六、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北平研究院出身的钱三强就作为中共中央选定的科学家代表参与筹备建立科学院的方案，起草《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等基本文件。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竺可桢在北京科学界的庆祝会上说“中央研究院与北京研究院为姊妹，将来即成大家庭”。

八、1949 年 11 月 5 日，即中国科学院挂牌办公后第五天，首先接管的科研机构是北平研究院的原子、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和历史六个研究所，次年 3、4 月才陆续接管中央研究院在沪、京等地所属各所。

九、中国科学院首任办公厅主任是曾任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主任和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而钱三强不但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的组建与调整，还先后主持计划局与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工作。中国科学院早期实行学部制，初次学部委员推选工作的主事者之一也是钱三强。

以上这些史实，以及围绕着北平研究院 20 多年历史所涉及的人物故事，特别是隐身其后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国内外背景，在读者眼前的这本《国立北平研究院简史》中都有交代。它对于纠正已有研究文献上的失衡以及由此带来的认识上的片面性将大有助益，也将有利于今人更为客观和健全地认识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历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曲折、复杂性与多样性。

作者刘晓曾随我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2004 年他在入学考试中总分名列第一，同时也被报考的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录取，最终他选择了进入国家科学院下属的专业研究所深造，学位论文就是《李石曾与北平研究院》。在论文写作期间，刘晓广泛收集资料，参考研习了大量原始文献和相关的研究成果，亦曾前往南京二档馆以及京郊、河北高阳等地调阅档案和实地考察，论文获得评审专家的好评。

毕业后，刘晓一面参加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及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一面继续深入考察博士阶段遗留下

的一些问题。2008 年获得法国“人文之家”基金会的资助，前往巴黎从事博士后研究，得以接触李石曾和其法国友人的后人，走访蒙达尔纪农校、巴斯德研究所、世界社、豆腐公司、华法教育会等多处旧址，用功于郎之万档案馆、巴黎科学院、巴黎国家图书馆、里昂图书馆等地，目标是对北平研究院与法国启蒙思想和法国学术界的渊源进行考察，期间的研究成果都凝聚在本书之中。

相比于博士论文，本书在论述空间上作了很大的拓展，补充了大量材料，加强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评论，文字上也显得更加老道成熟，特别是作者有意识地采取更加超然的立场，克服了博士论文中时而流露出的对论主给予过多同情和辩护的倾向。然而以严格的学术标准来判断，本书还不能说完美无瑕。比如说书中提出的那个留学运动与科学家成长的“十年规律”就显得比较粗糙，对北平研究院下属机构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完善。此外，作者一直没有机会对收藏在海峡彼岸的相关档案及研究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弥补这一缺憾只能俟之来日了。

在此书之前，刘晓已经出版了一本《卷舒开合任天真——何泽慧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传主与北平研究院多少有些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博士阶段从事课题的延伸。这一事实或许可以给有志投身学术研究的年轻朋友提供一点启发，那就是好的选题与锲而不舍的精神对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历史很会开玩笑，九年前刘晓在国内顶级名校与国立科学史研究所之间选择了后者，九年后我从研究所退休而被清华招去帮闲。刘晓请我为他的新书写一篇序，我乐意为之并想起了这个故事。科研和教育，本来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在组织结构上融为一体也许更有益于学术的健康发展。李石曾有过这样的梦想，只是时不予他罢了。

刘 钝

2013 年 10 月 17 日于中关村梦隐书房

目 录

总 序

导言 百科全书之梦	1
第一章 近代学术界留法群体的形成及其科学教育事业	8
1. 北平研究院主要成员留学背景分析	8
2. 巴黎“世界社”及其早期事业	13
3. 勤工俭学运动与中法大学的创建	19
4. 大学区制改革与两院分立	24
第二章 北平研究院的建立与机构设置	29
1. 研究院的拟议与北平研究院的设立	29
2. 经费与院址安排	31
3. 百科全书理念的实践——北平研究院的早期机构设置	37
第三章 北平研究院的黄金时期	48
1. 北平研究院的组织规程和规章制度	48
2. 1929—1937 年行政事务概述	55
3. 行政各部的工作	64
4. 1929—1937 年学术成就概述	71

第四章 学术高地——北平研究院理化部 75

1. 理化部的基础建设与人员设备配置 76

2. 物理学研究所与镭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84

3. 化学研究所的工作 90

4. 药物学研究所的工作 92

第五章 门类齐全——北平研究院生物部 95

1. 生物部的基础建设与设备配置 96

2. 生理学研究所的人员和工作 101

3. 动物学研究所的人员和工作 104

4. 植物学研究所的人员和工作 111

第六章 时空记忆——北平研究院人地部 119

1. 史学研究会（所）的工作 119

2. 地质学研究所的工作 126

第七章 风格独具——研究会与附设机构 134

1. 各研究会概况及工作 134

2. 附设机关及其工作 143

第八章 北平研究院战时迁滇及复员时期 155

1. 北平研究院战时概况 155

2. 抗战时期各所概况简介 160

3. 复员和维持时期 167

4. 抗战与复员时期的科研状况 176

第九章 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及会员制度的建立	178
1. 学术会议第一次大会	178
2. 第二次学术会议的筹备和会员的产生	181
3. 第二次学术会议	185
4. 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与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	189
第十章 从北平研究院到中国科学院	193
1. 北平研究院的军管与中国科学院的成立	193
2. 物理组研究所的调整	201
3. 化学药物组研究所的调整	203
4. 生物组研究所的调整	208
结 语	213
附 录	215
附录 1: 国立北平研究院大事记	215
附录 2: 北平研究院职员总表	221
附录 3: 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录	267
参考文献	272
索 引	279
后 记	286

导言 百科全书之梦

2011年6月20日，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97岁的何泽慧先生辞世；2012年10月22日，原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106岁高龄的王云章先生在美国溘然长逝。随着他们的离去，北平研究院的科学家群体至此谢幕。

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6月，国立北平研究院成立于1929年9月，它们是1949年前我国两个最重要的“国字号”大型综合科研机构，其先后成立标志着我国科学研究的体制化进程的基本完成。两院同时筹备并相继挂牌，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社会条件也基本相同，创建者和主持人之间也有紧密的联系与互动。但两个机构的组织形式、学术群体、战略布局、研究旨趣和历史地位等却不尽相同。目前，人们对北平研究院的关注相对于它在中国科学事业建制化过程中的贡献而言，显得极不相称。同样，相比于蔡元培及留美学人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文化与学术史上均留下了显赫声名，北平研究院的创始人李石曾及留法学人群体都几乎被人遗忘。

据统计，1949年前归国的科技人员，留法群体只占4%，位居美、英、日、德之后^[1]。相比较而言，留美群体一枝独秀，其次是留英群体，他们中不少是经过庚款留入学考试选拔的优秀人才，1949年前回国的科技人员中四分之三以上属于这两个群体，为我国科技界的主流；留日群体虽人数众多，但侧重军事和政治领域，在科学研究方面贡献突出者鲜见；留德群体质量较高，尤其在地质、工学等领域成绩突出，但因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和战败国，20世纪30年代末中德关系中断，这一群体后继乏人。

说到留法群体，它在近代中国的科技界和教育界格外引人注目，甚至一度与留美学人相抗衡。留法群体的特殊性在于：其一，有较强的组织性，李石曾及其世界社团是留法教育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以团体或机构的形式开展活动，人为推动的色彩浓厚；其二，留法群体兼具科学研究与改良社会的使命，几位领导者本身即为革命活动家，在投身政治革命之后，视教育与科学为社会革命之手段，他们对法国的体制和文化极为推崇，长期致力于中国实践；其三，留法群体有明确的社会建设理念，故回国

后能集中到某些机构和团体，保持与法国知识界的紧密联系，从而形成特有的文化现象，以至有“法国文化派”之称。

政府资助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往往是政治与学术结合的产物，这一进程在我国是由留法群体主导实现的。20世纪初年，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在法国成立世界社，追随孙中山，通过办报、资助、回国组织等方式襄助革命，奠定了在国民党中元老地位。辛亥革命胜利后，蔡元培、谭熙鸿、汪精卫^①等人加入世界社，他们均曾到法国留学，自此留法教育运动开始。早期留法群体在政治上信念坚定，地位崇高，其中蔡元培和李石曾尤其重视教育与学术。正是他们主要模仿法国相关制度，成功设立国立研究院和推行大学区制教育改革，并且最终，蔡元培、李石曾二人分别负责了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

从科学体制化的进程看，自19世纪末以来，世界科学研究的重心由大学向研究所转移。李石曾有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从事研究的经历，蔡元培则了解德国成立威廉皇帝学会的创新意义。两个研究院的奠基者均重视开展具体的科学研究，因此两院没有效仿西方传统科学院的院士（会员）制度，而是直接采用了“研究所”模式。

在体制方面，北平研究院更具有探索性。不仅设立了完备的行政体系，还将研究所与研究会并立，研究会实行会员制。北平研究院还率先召开“学术会议”，为会员（相当于院士）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不仅延续了研究所体制，还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北平研究院的行政体系。

科学研究方面，虽然法国科学的整体水平在西方国家中并不突出，但仍有其优势。其一是物理领域，有两代居里夫妇、郎之万等科学大家，他们与北平研究院均有联系。郎之万是北平研究院聘任的唯一名誉研究员，居里夫人的第一位中国学生郑大章、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学生钱三强、何泽慧、杨承宗等都进入了北平研究院。严济慈主持的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成绩在当时居国内领先，在法国发表论文数十篇，郎之万、狄拉克、玻尔等国际著名物理学家都曾到访。而且，效仿巴黎镭学研究所，在居里夫人的帮助下，北平研究院也设立镭学研究所，并于1948年改组为原子学研究所，这是我国当时唯一的核物理研究机构，后来在钱三强的领导下，新中国的核物理事业即从这里起步。其二是生物学领域。法国既有雄厚的博物学传统，也有巴斯德研究所这样先进的实验生物学机构。李石曾本人还在巴斯德研究所率先用化学方法研究大豆并发表专著。北平研究院的生物学研究门类较为齐全，建院之初即分设三个研究所，分别从事动物学、植物学和生理学研究，其中植物学研究所还拥有专属的植物园。

^① 蔡元培为留法俭学生；谭熙鸿为稽勋留学生，本为留美，应李石曾的请求而改留法；汪精卫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留法。另褚民谊1906年即随张静江到法，也是世界社发起人之一。

在体制探索和科学研究之外，北平研究院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不可忽视。北平研究院聘任的研究员大多有十年的留学经历，他们对法国社会和文化的了解绝非浅尝辄止。以李石曾为例，他不仅接触到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还出入上流社会沙龙，与无政府主义者过从甚密。由此，李石曾按百科全书的学科划分理念设置北平研究院的早期机构。效仿百科全书派的工作，北平研究院设有专门的出版部，致力科学的宣传与普及。设立海外人地部，派专人到法国译介相关作品。北平研究院的科学家群体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浓厚，行事不羁，李石曾、吴稚晖、朱洗、毕修勺等人都是坚定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和宣传者。北平研究院设有自治实验村事务所，在北平西山一带开展合作社等社会实验研究，开我国乡村教育与建设之先河。而且，作为更为庞大的百科全书——世界社体系下的一环，北平研究院与中法大学、故宫博物院、天然博物院、农工银行、中国国际图书馆、世界书局等形形色色的机构开展合作，成为法国文化思潮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重要机构。

当然，受制于这些特点，北平研究院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世界影响持续降低。过于倚重法国，使得北平研究院的学术资源难以为继。同时，民国政府没有发展科学的长远规划，经费投入一直没有增加，研究规模得不到扩充。它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却担负了太多的社会职能。但是在世界社过于封闭的体系下，“留法派”的特色使得研究人员长期稳定而与外界形不成流动和互动，密切合作的高校仅中法大学一家，致使其科学研究和社会意义也较少为外界所关注。直到后期，北平研究院撤销了与科学研究关系不大的各类研究会和附设机构，打破地域界限，在上海、陕西、昆明等地建立机构，广泛引进留学各国的归国人才，简化行政体系，其地方性和法国色彩才逐渐淡化。

在科研体制的探索过程中，北平研究院的主持者，院长李石曾和副院长李书华对研究院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大体而言，李石曾志向高远，长于谋划，喜好探索，但行事率性，用人唯亲；李书华办事缜密，秉持公正，任劳任怨。北平研究院的成功，是和二人的密切配合分不开的。李书华较好地执行了李石曾的设想，又对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加以纠正，获得了国内学术界的认可。

那么，又该如何评价作为留法派和北平研究院的缔造者李石曾呢？从总体上看，他思想锐进，积极借鉴西方的文化和科学，但又摆脱不尽旧时代的影响。李石曾为晚清重臣、清流派代表人物李鸿藻^①之子。清流派大多对个人形象和声誉非常珍惜，李鸿藻门生故旧遍天下。和他们一样，李石曾也极为重视社会声望和人际交往。他自奉简

^① 李鸿藻（1819—1897），历任清朝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吏部尚书等职。

朴,实行素食,发起进德会和社会改良会,终生恪守最严格的进德会^①戒约,且倡导科学与文化,鼓吹合作,颇有以道德完人自居之意。由此在政学两界长袖善舞,以其社会声望和人脉关系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机构和团体,为弘扬科学、教育与文化事业不辞劳苦。然而,李石曾囿于传统的用人观念,缺乏现代的管理思维。他任用亲信主持各类机构,这些人也仿效引用私人,造成多个机构的经营、管理、办学等成绩不甚理想。在20世纪30年代初,学界派系倾轧,许多留法派成员被逐出教育界。李氏人马主持的故宫博物院最终授人以柄,被诬以“故宫盗宝案”,多名亲信牵连其中,李石曾本人的社会声望也受到重大打击。北平研究院拟与故宫博物院合作的国学部成为泡影,植物学研究所在天然博物院经营五年的植物园甚至遭到铲除,留法派的事业一度陷于沉寂。

李石曾的科学观是其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思想的一部分。他的科学研究活动和对科学的倡导,应置于其社会理念和社会活动的框架下理解。法国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国家,对于怀抱着改变中国社会理想的李石曾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而对法国文化也推崇备至。不同于职业的科学家,李石曾更多的经历在于从事革命和社会活动,他对科学的理解和受到的训练又是有限的,实际上往往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重新阐释科学概念。如他对拉马克遗传学说的理解,就将其与社会关系中的互助合作和无政府主义的互助理念联系起来;通过对大豆的研究,则迅速转向无政府主义的素食实践以及豆腐公司的招工和俭学等。这些片面观念导致他对日益职业化的科学缺乏清晰的认识。因此,李石曾的功绩在于促成科学与政治的结合,实现国立研究机构的建立,而他对科学活动的组织和体制设计在许多方面并不符合科学体制化的主流,早期人地部、文艺部的设置,以及后期学术会议会员的推举等,在学界获得的评价都不高。与之形成对比,中央研究院体制的完善,更多地是在评议会等职业科学家共同体的努力下实现的。

相对于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由于规模较小、存在时间较短,以及后来留法群体的相对冷寂,从而较少受到学界关注,对北平研究院和李石曾的研究专著也相对缺乏。但是,有关原始资料却比较丰富,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相关研究。

关于北平研究院最权威的文献首推李书华的《二十年北平研究院》^[2]。李书华自始至终担任北平研究院副院长,全面处理日常事务,参与北平研究院成立、发展到终止的全过程。文中他将北平研究院划分为创设发展、抗战迁滇、复员暂停三个时期。另一篇比较深入的论文是陶英惠先生的《国立北平研究院初探》^[3],文章重点分析了北平研究院的组织与性质、研究方向及对科学的贡献,并对主持人物和经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林文照先生也写过一篇《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4],介绍了北平研究院的组织结

^① 1912年,李石曾、汪精卫、张继、吴稚晖等发起进德会,以“不狎邪、不赌博、不置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为戒约,后来蔡元培在北大还进行过推广。

构变迁，并对各研究所情况简单提及。

至于北平研究院下属 9 个研究所，大多有研究的专文。胡宗刚《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史略》^[5]一书，全面记述了该所的历史，挖掘了很多有价值 and 具启发性的史料。张九辰的《地质学与民国社会：1916—1950》^[6]研究了地质调查所的历史，该所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曾用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的名义。刁娅君的硕士论文《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初探》（2008），对史学研究会（所）的工作做了较好的梳理。此外还有胡升华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述评（1929—1949）》^[7]，姜玉平的《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二十年》^[8]，李艳平等的《20 世纪 40 年代在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流产的原子科学研究》^[9]，张逢、胡化凯的《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1932—1948 年）》^[10]，夏武平等《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小史》^[11]，王宗训的《回忆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12]等，另外在袁振东的博士论文《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1929—1937》中，也有涉及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的内容。这些研究一般都是学科体系研究的一部分，而不是立足于整个北平研究院的系统研究。同时，对于生理学研究所，以及各类研究会、附属机关等的研究，尚属空白。

北平研究院的一手资料比较丰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专题保存有北平研究院的 450 余卷档案，这些档案对研究北平研究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北平研究院从 1930 年 5 月到 1936 年 11 月出版的双月刊物《院务汇报》达 40 期，载有各下属机构工作报告和研究成果，是抗战爆发前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献。北平研究院自 1934 年至 1944 年，均出版有各年度工作报告，职员录则自 1930 年起逐年出版至 1949 年（抗战时期为油印）。北平研究院还编有综合性介绍资料，有北平研究院编《国立北平研究院概况》（1933 年，中、英双版）、院总办事处编《北平研究院》（1933）、行政院新闻局编《国立北平研究院概况》（1948）、国立北平研究院编《国立北平研究院抗战及复员期间工作概况》（1947）等。同时，各研究所还以集刊、汇刊、书籍的形式出版自己的科研成果。哥伦比亚大学还存有李书华收藏的大量书信（包括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致李书华的信），以及不少关于北平研究院的珍贵资料。

关于北平研究院重要人物的资料和研究主要有：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李石曾先生文集》^[13]两册，较为全面地收集了李石曾的论著、演讲、书信和笔记等。朱传誉搜集的发表在台湾各种刊物上关于李石曾的文章 50 余篇，复印汇编成《李石曾传记资料》^[14]三册，是研究李石曾的重要参考资料。杨恺龄的《民国李石曾先生年谱》^[15]，以编年史的形式对李石曾的生平活动进行了整理。陈纪滢的《一代振奇人——李石曾传》^[16]，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李石曾一生的活动，但大多是直接引用其他的文献，缺乏必要的加工。叶隽的《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17]较为深入地论述了李石曾的思想。李书华出版有自传《碣庐集》^[18]，严济慈、钱三强等著名科学家各有文集和传记若干出版。还有不少科学家被收入《北京中法大学史料》^[19]、《永远